

#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王 汎 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中文摘要

胡適與傅斯年通常都被視為屬於同一派的學者，而且一般都知道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受到胡適極大的啟迪。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事實。在這一篇短文中，我想就一般人所較忽略的層面，也就是胡適如何受到傅斯年影響的部份，作一探討。我的討論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傅斯年對胡適古史觀之影響，第二、傅斯年對胡適文學史觀念的影響，第三、傅斯年的哲學觀點與胡適。

**關鍵詞：**胡適、傅斯年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想以胡適文史觀點之形成，說明他的學生傅斯年在其中產生的作用。

幾十年來胡適與傅斯年常被當作同一個學派。在政治上，中共所發起的批判胡適思想運動中，提及胡適的「黨羽」時必提傅斯年。<sup>1</sup>在學術上，提到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時，亦必提到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是這個運動實際的中心。他們兩人關係密切，不言可喻。當傅斯年病逝時胡適所發表的紀念文字尤其證實這一點。胡適提醒大家中國喪失了它最忠實的愛國主義者。同時，胡適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記上寫著：

---

1 關於胡適與傅斯年這個題目，已有人寫過，但頗有錯誤。如蔣星煜〈胡適與傅斯年〉（刊於《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一文中說「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胡適在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小說科作了〈論短篇小說〉的演講，傅斯年已經畢業，在研究所當研究員，他為胡適記錄後，即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頁85）。所謂「畢業」是不了解當時北大學制的說法。研究員可以是大學本科畢業

今天下午四點半，宋以忠夫人（應誼）打電話來，說AP報告傅斯年今天死了。這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損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學問，又能治事，能組織。他讀書最能記憶，又最有判斷能力，故他在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績都有開山的功用。在治事的方面，他第一次去廣州中山大學，第二次在中研院史語所。第三次代我作北大校長，辦理復員的工作。第四次做台大校長，兩年中有很大的成績。<sup>2</sup>

因為胡、傅二人在生活、學術上異常密切，故大家在注意到二人的相似處之餘，竟常忽略了二人的相異之處。也因為傅斯年是胡適的學生，所以一般也注意胡適對傅的影響，而少留心傅氏對胡的影響。

在傅斯年結識胡適的卅五年中，同在中國的時間，只有不到十五、六年（北大二年、民國十六年至廿六年，民國卅五到卅六年），其餘時間皆相睽隔，而同在中國的時間內，住在同一城市者只有在北京的幾年，也就是他們共同發起《獨立評論》的一段日子。

胡適與傅斯年的關係有過幾度變化。在新文化運動以前胡適並未大受歡迎。毛以亨回憶說民國五年胡適初到北大後數日曾講墨子，毛與傅斯年去聽，未覺精采，所以當時胡適與馬敘倫共同指導的十六個研究員，十五人跟隨馬敘倫研究老莊，而只有班長趙健一人與胡適研究墨經。這自然與當時整個學術風氣尚未轉變，章太炎學派仍佔主流地位，太炎大弟子馬敘倫吸引大量對文史感興趣的學生是很自然的事。毛以亨回憶說，當時他們聽完胡適的墨子演講：

回來覺得類於外國漢學家之講中國學問，曾有許多觀點，為我們所未想到，但究未見其大，且未合中國之人生日用標準。<sup>3</sup>

---

生，也可以是高年級學生，而傅氏屬於後者。又如說傅斯年當時由黃季剛的得意門生轉而追隨胡適，「人們對之迷惑不解，陳獨秀寫信給周作人，懷疑他是什麼人派來的奸細。胡適只覺得他恭順可愛，第二年就讓傅斯年用庚款到英國倫敦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去留學了」（頁85）。是否「恭順可愛」沒有材料記載，不過傅氏赴英唸書是考上山東官費，既不是過去所傳是受穆藕初資助，也非此處的使用庚款。胡頌平《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頁二九三二「今天蔣復璁帶來民九、民十兩年的北政府教育公報」，「編者附記：在附錄裡，還有傅斯年當年考取出國的分數是八十二分，第二名。」為了這次官費考試，還有一個插曲，即許多考官因為傅斯年是激烈學生而不擬錄取。當時山東省教育廳的科長陳雪南出面力爭，認為成績如此優秀的學生非取不可，終於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後陳雪南與傅氏保持相當友好關係，民國三十七年，傅在美國，竟被選為立法委員，傅氏不就，也是託陳雪南勸說才接受。

2 《胡適的日記》（臺北：遠流，1989），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條。

3 以上皆見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適〉，原刊香港《天文台》，無日期，見《傅斯年檔案》（以下簡稱《傅檔》）I：1696。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與傅氏關係極為密切，胡適是《新潮》的指導老師，而傅是《新潮》的主編，又是胡適心中在舊學根柢上極令人敬畏的學生。可是傅斯年在歐洲遊學近七年而未得任何學位，在胡適看來是一大失敗，故民國十五年胡適日記上便記有，傅斯年甚「頹放」，在歐遊學而無所成之類的句子。此外，日記中並塗去九行顯然對傅不滿的評語。<sup>4</sup>不過，他也感受到傅斯年許多精闢的見解，故同時的日記中不時有這樣的句子，「談得很好」，或傅氏精彩的論點太多「不及記下」。<sup>5</sup>

當時胡適顯然是拿傅氏與顧頡剛相比。顧氏在新潮時期的名字是顧誠吾，當時並未佔有傅斯年般顯著的位置。不過他後來因為替胡適訪求與紅樓夢相關的書籍，又與胡適共同發起標點出版《辨偽叢刊》，懷疑上古信史而名滿天下。當民國十五年胡適與傅斯年在歐洲相見前，《古史辨》第一冊已結集出版，瞬間暢銷，<sup>6</sup>其聲光之盛，自然使得胡適對眼前的傅斯年感到失望，故胡適在當時日記上說傅斯年不及顧頡剛之勤。<sup>7</sup>

傅氏回到中國後，在中山大學任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曾多次電邀胡適到中山任教，甚至將課程預先排出，但最後胡適仍未赴任。傅與顧頡剛同任教於中山大學時，兩人關係急速惡化。《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收有顧頡剛向胡適控訴傅氏專權任性的信件。胡適將攻擊傅斯年的信給傅氏看過後，引起兩人極大的不快。<sup>8</sup>

民國十八年，史語所遷北平，當時胡適在上海，不過自民國十九年以後，胡適與傅斯年便因同在北平而常有見面機會。胡適日記中屢屢有傅斯年今夜來談，或談身世，或談上古史事，胡無不激賞，並認為傅氏在當時上古史之見解當不做第二人想。其中胡適對史語所年輕人才的訓練及成績尤其感到

4 這九行在《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五年九月五日條，無頁碼。它們可能是胡適決定將日記交傅氏在台代為保管時塗去，或是胡適重讀日記時抹去。

5 《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五年九月二日條，無頁碼。

6 而後恆慕義(Arthur Hummel)還在地位極高的《美國歷史評論》中撰文介紹。Arthur Hummel, "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XIV, No4, July 1929.此文亦收在《古史辨》第二冊，頁421-443，後附中譯。

7 《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五年九月五日條。

8 顧潮，〈顧頡剛與傅斯年在青壯時代的交往〉，《文史哲》，1993年第2期，頁17。從最近公佈的一封信(此信並未包括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可以發現傅、顧兩人的衝突或有另一原因。在這封信中，顧頡剛希望由他與胡適分史語所之權：「……最好，北伐成功，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研究所搬到北京，由先生和我經管其事，孟真則在廣州設一研究分所，南北相呼應。這也須先生來此商量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四十二，頁353-4)

驚喜。安陽殷墟發掘的成果也深為胡適所欣賞，<sup>9</sup>日記中甚至還保留了當時媒體報導史語所的剪報。<sup>10</sup>這些事蹟皆使胡適對傅斯年的印象改觀，同時胡適與顧頡剛則日漸疏遠。<sup>11</sup>整體而言，從民國十五年，傅斯年在三方面對胡適有所影響。首先要談胡適古史觀由疑而信的過程，及傅斯年在此變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 一、古史觀

傅斯年對胡適古史觀的影響殆有兩個方面：第一是疑古思潮之衰褪，第二是多元的古史觀。而這兩者其實也有相會合之處，即多元的古史觀其實解決了古文獻中的一些矛盾，而使得原來認為是古人作偽的，現在可以別有合理的解釋。

胡適、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皆傾向於疑古。胡適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中說尚書「或是儒家造出的託古改制的書」「無論如何沒有史料的價值」。<sup>12</sup>後來相信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的臆測，認為商代的中國仍是新石器時代。<sup>13</sup>他同時也受晚清今文家疑偽思想的影響，在民國八年的井田論戰中，一再說《周禮》是偽書，王制是漢朝博士造的，<sup>14</sup>而且又強調東周以前古史不可信。傅斯年在《新潮》的文章中偶然也說東周平王以後「始有信史可言」，或是誇讚《史記志疑》等疑偽之書的價值。<sup>15</sup>可是到了民國十五年左右，從歐洲留學回來後的傅斯年對古史的看法已有改變。但當時胡適還很支持顧頡剛《

9 如《胡適的日記》，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六日。

10 《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11 胡適與顧頡剛感情之漸趨疏遠應該是當時人所感覺得到的，所以當時顧頡剛的學生何定生出了一本《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此冊不能得見，不過可以由顧氏給胡適的一封信中看出其大概：「有一件事情，使我很不安的，是何定生君出了一本《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趁我不在北平的時候，用話騙了樸社同人，印出來了。其中文字，有幾篇是在廣東做的，先生已見過，有幾篇是新近作的，其中對於先生頗有吹索之論。這也不管，他不該題這書名，使得旁人疑我們二人有分裂的趨勢，而又在樸社出版，使人疑我有意向先生宣戰」（顧潮，《顧頡剛年譜》，頁402。）

12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商務，1978），頁22。

13 見《古史辨》冊一，頁120，胡適寫信告訴顧頡剛「發現灑池石器時代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又《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六日，「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據灑池發掘的報告，認商代為在銅器之前。」

14 《胡適文存》（臺北：遠東，1990），頁430-1。

15 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頁1231；〈清梁玉繩著《史記志疑》〉，同前書，頁1417-1419。

古史辨》的工作，並樂道其實驗主義方法在古史辨的大成果。<sup>16</sup>

傅斯年對古代歷史由疑轉信的過程是逐步發展逐步調整的。在民國十三至十五年傅氏斷續寫成的〈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中已露出徵兆。此時他對於古史信多於疑，雖然處處還流露著晚清今文家疑偽的口氣，而且認為堯、舜、黃帝等可能是傳說，但態度實大大不同，而且商、周為東西二集團的初步想法，以及東夷一地（渤海灣一帶）是中國古文明的發源地之想法也已隱然成形。雖然因為沾染今文家說而對《左傳》等書的態度仍有所保留，但基本上已信過於疑了。而且覺得古文家，五行等必有很長的淵源，不可能只是順應政治需求而造出。<sup>17</sup>傅氏回國以後，回過頭來治中國古代文史之學，從〈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等文章便可發現他已發展出一些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論述。<sup>18</sup>不過五四這一代青年基本上對傳統文獻沒有太大信心，他們相信的是科學地下發掘的成果。從民國十七年起，安陽殷墟的發掘逐步使傅氏相信古史辨派過疑，故此後文章常駁古史辨派。如〈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中，便因「命周侯」一段甲文而懷疑古史辨派所提的商、周不相臣屬之說。<sup>19</sup>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傅斯年的一本題為《答闌散記》的筆記本中，有一則短篇諷刺小說。這一則小說無法斷代（大約寫於民國十九年左右），文字潦草凌亂，極不易辨認，<sup>20</sup>全文是諷刺錢玄同及顧頡剛的，尤其針對古史辨最核心的方法論「層累造成說」，極盡揶揄嘲諷之所能事，而這個方法論正是他過去認為是顧頡剛「將寶貝弄到手」的「寶貝」，現在卻譏為是荒誕之至。這件檔案曾由杜正勝先生加以隸定，由於它在近代疑古思潮衰褪的過程中是極為重要的史料，我徵引全文如下：

時宇相對，日月倒行，我昨天在古董舖裡搜到半封信，是名理必有者寫的，回來一查通用的人名典，只說理必有是民國三十三世紀的人，好為系統之疑古，曾做古史

16 《傳檔》I 1678胡適1926年8月24日致傅斯年信，信上說「頡剛在他的《古史辨》自序裡說他從我的《水滸傳考證》裡得著他的治史學方法。這是我生平最高興的一件事」。

17 Wang Fan-shen,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h.D dissertation, 1993), pp. 175-185.

18 《傅斯年全集》，頁739-744。

19 《傅斯年全集》，頁959-1005。

20 我曾於一九九〇年，將其中一部份譯成英文，附在我的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續辨十大冊，謂民國初建之時談學人物頗多，當時人假設之名，有數人而一名者，有一人而數名者，有全無其人者，皆仿漢儒造作，故意為迷陣以迷後人，其謂孫文僅西游記孫行者傳說之人間化、當時化，黃興亦本黃龍見之一種迷信而起。此均是先由民間傳信，後來到讀書人手中，一面求雅馴，一面借俗題寫其自己理想的。此等議論盛行一時，若干代人都驚奇他是一位精辟的思想家，他這信的原文如下：

中華民國三千二百十四年六月十日疑成疑縣理必有奉白：

顧樂先生：辱你賞我一封信，敘述你先生自己于民國初建之史料上之心得，何等可感！細讀幾回，甚為佩服。我于此時史事亦曾研究，其一面始以為論一是當時文士之一面，數年後頓覺此實是當時一切史事之線索。蓋當時史事多此數君以一種理想為之造作者，弟已布專書，現在略舉兩三個例：弟于胡適年譜上已證成世傳之胡適文存很多是後人續入者，于顧君考上證名（明）顧君古史解頗多增改，此均不甚著警之論。其使人可以長想者，則有如錢玄同問題。世人以錢玄同與疑古玄同為一人，實是大愚，更傳會謂錢越人故武肅王之苗裔，則等于橋山有黃帝陵一種之可笑矣。查玄是滿洲朝康熙帝名，是則此名必不能先於民國元年，若同在民國元年改的，則試看所謂錢玄同一人之思想實是最薄中國的古物事者及通俗事物者，有此思想之人必不于此時改用此一個百分充足道士氣之名無疑，故如玄同為王敬軒之字，猶可說也。玄同為此等思想之人之改定名，在理絕不可通。又如錢之一字今固當有姓錢者，今世人用文采粲然之紙幣、皮幣大張精印，而三千年前則用一種不便當的可憎品，當時人尤以為不然。今雖書缺文脫而常常見「銅臭物」一個名詞，果然自己改名玄，名玄同，其何不並姓而亦改之？胡留此一不甚雅之字以為姓乎？細思方覺此實一非有先生，亡是公子，姑名為玄同，以張其虛，姓之曰錢，以表其實，世無有虛過於玄而實過於錢者，以此相反之詞為名，實系一小小迷陣，若謂前人曰：看破者上智，看不破者下愚。何以見得呢？錢君後來至改姓疑古，疑古二字與錢同以喉音為紐，明是射覆的意思。我又比列一切見存錢君著作，所有在陳氏理惑集，按此必新青年知於後世之名，胡氏春秋，按此必適之先生之努力及其讀書雜誌，古史解，按此必君之古史辨也，按其年次而列之，見其顧不一貫，顯系至少有三人，一為一欲舉一切故傳而匯之者，一為一好談當時之所謂注音字母者，一則組為一以一種激斷論治經史材料者，所謂疑古玄同是也。此三類行radicalism文上甚不同，雖然勉強使其外表同，使其成部前後一貫因而吃力勉強造成此前後求若一貫之狀態，從此愈為顯著。余曾斷定末一玄同（疑古）實顧頡剛舉其最激斷之論加此名下而布之，其他二端，亦當時理惑集中人所謂之[亡]有先生，蓋理惑集中無此[亡]格者，建築意義

上為不備格，一切證據均詳該書（惜乎，此地不詳舉，可惜，可惜，我的注）謂余不信，則試看玄同名下一切文字中之含性，始也便是一切掃蕩之談，而卒之反局於辯經疑古之續，如有錢玄同其人，必是一多聞中國故事者，於其名下之文（字）中可見，如先弄了些中國故事，後來願舍而去之，亦必先經辯經疑古之一步，然後更放而至於為一切掃蕩之談，理為順敘，若既已至於一切掃蕩矣，又安得轉身回來標小言詹詹之疑古氏哉？此種顛倒之理敘，按之今時通以為然，胡適氏之個人或社會思想進化步次論，絕然不符，按之顧君之累層地造成之組織學論亦無，譬如藉薪，後來居下（按「下」字旁標二圈）者也，今人信民國初之人之疑古而忘疑民國初之人之古，不知民國初之人性德上亦如漢初之人耳，見斯公整齊文字則謂史籀亦然，則有周公則謂亦有伊尹，此漢初儒者的說法。識破這些圈套矣而另造些圈套以試試後人之眼力，此民國初儒者的說法。明知沒有左丘明，更沒有丘明作傳的故事，偏自編一部書，說是丘明作的傳，這是劉子駿的辦法。明知沒有譙周，更沒有譙周作古史解故事，遍造了這斷（段）故事，又作了一部書，使他多學三分之二，同於烏有譙周之憑虛書，卻不說古史辯是詛信之作了。這是顧頡剛的進化的辦法。此之進化是時代的果……（下文不及見，可惜）

請頡剛轉以質之我們的玄同先生，這斷（段）小小疑古是難保無啊，或者是莫須有呢？我想諸公「作法自斃」、「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也。」<sup>21</sup>

殷墟中出土的大量器物，尤其是精美青銅器，也打破了胡適原先持之甚堅的「商是新石器時代」之說。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六日，他在史語所演講時便承認：

在整理國故方面，我看見近年研究所的成績，我真十分高興。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據灑池發掘的報告，認商代為在銅器之前，今安陽發掘的成績，足以糾正我的錯誤。<sup>22</sup>

此處所謂「商代為在銅器之前」，其實是一婉轉的說法。六、七年前，胡適認為商是新石器時代，而不是「銅器以前」。足見殷墟考古對其修正之大，而這一修正作用應該早從民國十七年底或十八年殷墟實物開始出土就已開始了，所以在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一日，當胡適選在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時，顧頡剛因辭了中山大學而順道過訪，胡適告訴他：

現在我的思想變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sup>23</sup>

21 《傅斯年檔案》II 910。杜正勝先生的隸定刊於《中國文化》，1995：12，頁250-251。

22 《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六日條。

23 顧潮，《顧頡剛年譜》，頁171。

顧頡剛說：

我聽了這話，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爲什麼突然改變的原因。後來他回到北大，作了一篇〈說儒〉，說孔子所以成爲聖人，是由于五百年前商人亡國時有一個「聖人」出來拯救他們的民族……這就是他爲了「信古」而造出來的一篇大謊話……宜乎這篇文章一出來，便受到郭沫若的痛駁，逼得他不敢回答。<sup>24</sup>

在一九五一年批判胡適的座談會上，顧頡剛說：

我本是跟著他走的，想不到結果他竟變成反對我。固然我所說未必對，可是他自己卻已「寧可信而過，不可疑而過了」……錢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對我說：「真想不到適之的思想會如此的退步。」<sup>25</sup>

胡適這一重大轉變應與殷墟發掘有關。胡適的疑古是有特色的，他的態度基本上是「寧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但是一旦發現地下材料可以證明不當疑時，馬上進行修正。民國十年一月廿八日，他在〈自述古史觀書〉中已說過這樣的話：

大概我的古史觀是：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軌道以後，然後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sup>26</sup>

所以當考古學有所發現時，他是可以很快修正其古史觀的，尤其是這考古工作如果是用科學的發掘，說服力更大。民國十七年秋天，董作賓率員在小屯發掘，已經發現不少重要東西，胡適不一定讀過他的〈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sup>27</sup>不過以他與傅斯年的關係，及傅氏對安陽發掘之重視，他對發掘所得必有所知。

民國十八年的第二次發掘從三月七日至五月十日止，由李濟所主持，「獲灰坑十三處，有字甲骨六百八十四版，並得大宗陶器、陶片、獸骨，銅器以及其他各種貴物」。<sup>28</sup>李濟是哈佛大學博士、清華國學院講師、也是第一次由中國人主持的科學考古山西陰村發掘的主持人，用的是科學方法，有清楚的地層記錄，這使得他的發掘的信服力大大增強。所以雖然所出銅器不多，

24 〈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上)，《中國哲學》二輯，頁341。郭沫若的駁文見他的《青銅時代》。

25 上海：《大公報》，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轉引劉起鈺，《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1986)，頁263。

26 《古史辨》第一冊，頁22。

27 李濟，《殷墟發掘報告》第一冊(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9)，頁3-36。

28 石璋如，《考古年表》(臺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2)，頁11。

但商代是一物質文明相當高的階段已可確定。在那年三月十一日胡適與顧頡剛見面之前，胡適未必知道這些新發現，不過民國十七年秋天以來殷墟的種種發現，當能逐漸改變商是新石器時代的看法。也就符合胡適前面所說的「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軌道以後，然後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所以他會告訴顧頡剛「我不疑古了」。

民國廿年，胡適進一步接受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中的觀點。據傅氏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在該文刊出的前記上說：

此我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也，是書經始於五年以前，至民國二十年夏，寫成者將三分之二矣。日本寇遼東，心亂如焚，中輟者數月。以後公私事紛至，繼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殺青，慚何如之！此章大約寫於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與其他數章於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胡適之先生。適之先生謬為稱許，囑以送刊於《北大國學季刊》。余以此文所論多待充實，逡巡未果。今春適之先生已於同一道路上作成豐偉之論文，此文更若燭火之宜息矣。而適之先生勉以同時刊行，俾讀者有所參考。今從其命，並志同聲之欣悅焉。<sup>29</sup>

這段引文中所指《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是傅氏未完成之作，周東封與殷遺民原為該書預定的第三章。<sup>30</sup>在傅斯年先生遺稿中尚有一些殘件，討論〈天問〉、種族變動與社會階級等問題。因此胡適先生在民國廿年冬見到不只是〈周東封與殷遺民〉，而且包括〈夷夏東西說〉的一些初步草稿。我在檢視傅先生遺稿時，在一個牛皮紙大信封中見到以上稿件中間夾著胡適的一張便箋（這張便箋沒有檔號）：

孟真兄：

大作極好。佩服！佩服！

如不難鈔寫，請鈔一份送給我作參考，如何？山東人今尚祀「天齊」，即黃飛虎。……

適之

廿、十二、十五

29 《傅斯年全集》，頁894。

31 胡適與傅斯年在民國廿年左右針對上古史事有過幾次談論，當時也正是傅氏撰寫《古代中國與民族》的後期，所以見面所談亦常環繞手中正進行的工作。民國廿年二月十七日，胡適日記上說：孟真來談。談他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此文論二事——，一因卜辭「命周侯」而論「殷周的關係」。兩題皆極大貢獻，我讀了極高興。

隔天下午，傅斯年又前往胡宅談論古史。《胡適的日記》廿年二月十八日條下：

下午孟真來談古史事，爾綱也參加。孟真原文中說「每每舊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

此處所指的「大作」一定是以〈周東封與殷遺民〉爲主的一批稿件，一方面因爲這封信夾在這份稿子中，二方面是因講到「黃飛虎」的部份，正是〈周東封與殷遺民〉之論點：

周人逐紂將飛廉于海隅而戮之，飛廉在民間故事中曰黃飛虎。黃飛虎之祀，至今在山東與玄武之祀同樣普遍。太公之祀不過偶然有之，並且是文士所提倡，不與民間信仰有關係。<sup>31</sup>

傅斯年認爲，魯的下層是殷遺民，他們祀的黃飛虎，即飛廉。而太公，是從西方來的周的統治階級所崇祀，故即使到現代山東祀姜太公也仍是上層文士所提倡的。

〈周東封與殷遺民〉對胡適的古史觀影響極大。他於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廿日，在〈傅孟真先生逝世兩週年紀念會〉上演講時提到〈周東封與殷遺民〉一文對他的影響：

我在《中國哲學史》內提到古代服三年之喪這個問題，感覺到很困難。孔子的弟子宰我曾說一年就夠了，但孔子卻說「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過了一百年以後，當滕文公繼承他父親爲滕侯時，孟子居然說動了滕文公，說喪禮應服三年。但當時滕國的士大夫都不贊成，他們都反對「三年」。他們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這兩句話與孔子的話是衝突的……究竟是孔子說假呢？還是滕國大夫錯了呢？<sup>32</sup>

有關三年喪的歷史矛盾使得胡適在哲學史中主張孔子「說假」，可是傅斯年的〈周東封與殷遺民〉用古史二元文化觀解開這個矛盾——殷朝雖然已亡，「但其後七百年間，上邊統治階級與下邊人民的習俗不同。絕對多數的老百姓是殷遺民，而三年之喪是殷民的制度，孔子自稱是殷人（而孔子之天下，大約即是齊魯宋衛，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爲證），所以孔子以三年之喪爲天下通喪是不錯的」。<sup>33</sup>胡適說「我接受了他的觀念，寫了一篇五萬字的文章，叫做〈說儒〉」，而從這個觀念來講，「根本推翻我過

料之若干點，則登時變成活的」，此意最重要。爾網此時尚不能承受此說。《胡適的日記》民國廿四年六月六日條上說：

孟真來談他的古史心得，特別是秦民族的問題，極有趣味。他是絕頂聰明人，記誦古書很熟，故能觸類旁通，能從紛亂中理出頭緒來。在今日治古史者，他當然無有倫比。

30 《傅斯年全集》，頁902。

32 《胡適演講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78），頁344。

33 同前書，頁345。

去對於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見解」。<sup>34</sup>尤其重要的是，在這個新詮釋系統中，孔子不必再如晚清今文家所極力主張的，是一個「說假」的人。細讀〈說儒〉全文，便可以發現貫串這篇文字的關鍵架構，便是周人在西，殷人在東，殷被周征服，但上邊的統治階級與下邊的人民文化習俗不同這個二元觀點。

胡適在〈說儒〉中說周是西邊來的征服者，而殷是東方的亡國遺民。儒原是殷民族的傳教士，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柔順的人生觀。殷亡國後，有一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懸記，而孔子乃被認為應此懸記而生的聖者，他將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為仁以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變為剛毅進取的儒。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漢大學的演說〈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中，胡適基本上也是使用了古史二元的論點：

（商民族）在這正在建設文化的時候、西方的蠻族——周，侵犯過來了，他具強悍的天性，有農業的發明，不久把那很愛喝酒的，敬鬼的，文化較高的殷民族征服了。這一來，上面的——政治方面是屬於周民族，下面就是屬殷民族，二民族不斷的奮鬥，在上面的周民族很難征服下面的殷民族，孔子雖是殷人（宋國），至此很想建設一個現代文化，故曰「吾從周」，而周時也有人見到兩文化接觸，致有民族之衝突，所以東方（淮河流域），派了周公去治理，南方（漢河流域）派了召公去治理，封建的基礎，即於此時建設。<sup>35</sup>

從《傅斯年檔案》中所存〈周東封與殷遺民〉的殘稿看來，它不是一次定稿，所以民國廿年胡適所讀的是初稿，夾在《古代中國與民族》的一堆稿件中，當時胡適還未想到要寫〈說儒〉。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胡適擬作〈原儒〉一文，尚未動手，<sup>36</sup>遂請傅斯年將前稿送來，這一次他看到的或許是〈周東封與殷遺民〉較為清楚的稿子。胡適日記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條記「孟真來談，他昨晚送來他的舊稿〈周東封與殷遺民〉諸文，於我作〈說儒〉之文甚有益，已充份採用，今天我們仍談此題。」<sup>37</sup>民國廿三年五月十九

34 同前書，頁346。

35 《胡適選集》（臺北，無出版社及年代），演說，頁86。

36 《胡適的日記》，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條。

37 《胡適的日記》，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條。章希呂日記中記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把適之兄做的〈說儒〉抄一、兩章，計一萬字。今天抄完。」（見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北京：三聯，1989，頁257。）在胡適寫〈說儒〉的過程中，傅斯年不時前往胡宅討論。根據羅爾綱在《胡適瑣記》中追憶「一九三四年春，胡適撰〈說儒〉，每星期下午，是他在家做研究的時間，傅斯年就過來共同討論。」（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北京：三聯，頁138）。章希呂一九三四年日記中也不時記傅斯年來胡宅之事（見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頁245-277）。

日，〈說儒〉脫稿，胡適在八月卅日給孟森的信上得意地表示此文是「數年來積思所得」，並說三年喪制這個久不得解決的制度，現可歸為殷禮，亦是「致思至十七年之久，近年始覺惟有三年喪制為殷人古禮之說足以解決一切疑難矛盾。」<sup>38</sup>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說儒〉中主張殷為祖先教，及殷代盛行人殉的觀點，也與傅斯年的〈周東封與殷遺民〉有關。胡適於一九四五年在哈佛大學神學院講座中依舊指出，「殷人的祖先教的用人祭及殉葬等慘酷風俗，引起後來思想家的反抗，故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都帶有 Agnosticism 意味。」<sup>39</sup>

胡適在〈說儒〉中其實已一再提到傅斯年對他的影響，但該文在一九三五年發表之後，一般讀者似未特別注意傅、胡二氏前後思想沿承的關係，故對於這一段思想公案常有誤解，如陳榮捷先生以英文撰寫《近代中國宗教趨勢》時，竟說胡適的〈說儒〉得到傅斯年的聲援，所不同的是，胡適所用皆傳統文獻史料，而傅斯年多用甲骨文材料。<sup>40</sup>

在〈說儒〉中，胡適推崇孔子為殷商亡國之後，是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懸記而起的聖者，他將「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比為耶穌基督的「懸記」，這是傅斯年原來所沒有的想法，可能與胡適撰稿期間所讀關於耶穌基督的歷史有關。<sup>41</sup>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由疑古轉而重建古代之時，也逐漸擺脫他早年深受影響的清季今文家言。錢穆注意到胡適在寫《中國古代哲學史》時，只用《詩經》，不用《左傳》，他問胡適緣故，胡適告以因當時過信清季今文家言之故。<sup>42</sup>但是他後來一步步擺脫此影響，除了傅斯年及史語所地下發掘的影響

38 見引於耿雲志，《胡適年譜》（香港：中華，1986），頁142。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北大時期的同學毛以亨，在追憶傅氏的文章中說「傅氏有若干獨到見解，如〈說儒〉，胡適之先生曾依其說而撰一長篇論文（〈關於傅斯年的一封信〉，香港《天文台》，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四日）。毛氏不治中國上古史，所以將整個事實顛倒了過來。不過他的回憶倒也說明了當時有不少人留意到兩人文章之間的關係。」

39 《胡適的日記》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這一段話可以與傅斯年的〈周東封與殷遺民〉及後來的《性命古訓辯證》的第三章相比較（參考《傅斯年全集》，頁902及頁602、622）。《胡適的日記》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

40 Chan Wing-tsit, *Religion Trend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1953), pp. 27-30.

41 據章希呂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記「適兄說新舊約是一部奇異之書」，似當時正精讀這一部書（見顏振吾，《胡適研究叢錄》，頁253）。攻擊〈說儒〉成為攻擊整理國故派的一個重點。郭沫若、錢穆、馮友蘭、范文瀾等都有文章批評。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一「懸記」，及商、周是否為二民族集團更是被攻擊的重點。

42 錢穆，《師友雜憶》（臺北，東大，1983），頁144。

之外，也當與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發表有關。<sup>43</sup>

錢穆在《師友雜憶》上對胡適古史觀的變化有扼要的觀察：

適之於史學，則似徘徊顧剛、孟真兩人之間。先為〈中國大史家崔東壁〉一文，僅成半篇，然於顧剛古史辨則備致稱許。此下則轉近孟真一邊。<sup>44</sup>

胡適的轉變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轉變，它代表一個由拆解上古史，到重建上古史的過程，而這個轉變竟發生在一開始提倡疑古辨偽的胡適身上。而促成胡適改變商是新石器時代、孔子「說假」等觀點的，主要是傅斯年的上古史觀，以及史語所殷墟發掘的成果。這種由疑而信，由疑偽而重建的趨勢，不只發生在胡適身上。殷墟發掘之後，才有講上古史的書敢將商代作為信史放在書的開端。<sup>45</sup>足見它所帶來的影響之廣泛了。

## 二、文學史觀及哲學觀

民國十五年八月胡適與傅斯年在巴黎見面時，傅斯年提出以發生學觀點治文學史的口號，也曾深深影響了胡適。傅斯年的觀點，貫串在兩年後所寫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中。他說文學的生命彷彿有機體：

都是開頭來自田間，文人借用了，遂上台面，更有些文人繼續的修整、擴張，弄得範圍極大，技術極精，而原有之動盪力遂衰，以致於但剩了一個軀殼，為後人抄了又抄，失去了擴張的力氣，只剩下了文字上的生命，沒有了語言上的生命。

文學史或者可以和生物史有同樣的大節目可觀，「把發生學引進文學史來」，是我們工作中的口號。<sup>46</sup>

在《傅斯年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份題為《赤符論》的筆記本，只有兩頁擬目，及一些零星的筆記。其中有一頁傅氏寫了一行「文學由俗而雅，由雅而典，由典而則，有則則死」，也是同樣的意思。<sup>47</sup>

43 譬如《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九年十月廿六日條「顧(顧剛)說一部份作于曾見錢譜(《劉向歆父子年譜》)之後，而墨守康有為、崔適之說，殊不可曉」。民國二十年三月卅一日的日記上則說「今天講西漢經學……我現在漸漸脫離今文家的主張，認西漢經學無今古文之分派，只有新的舊的，而無今古文分家。」

44 錢穆《師友雜憶》，頁147。

45 蘇秉琦，〈建國以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在《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300。

46 《傅斯年全集》，頁13。

47 《赤符論》，見《傅檔》，無檔號。

就在胡適與傅斯年見面大約十天後，當胡適為自己所編《詞選》寫〈序〉時，便沿用了這個說法：

但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採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到手之後，劣等的文人便來模倣；模倣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於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展了。<sup>48</sup>

胡適《白話文學史》基本上發揮這一想法，<sup>49</sup>胡適後來回憶說這是因為他與傅斯年見解的相同，他說：

我們做學問功力不同，而見解往往相近。……孟真有「生老病死」的議論，與我很相同。

此處談到文學形式「生老病死」之觀念，應該說是受到傅斯年影響，胡適在一篇回憶傅氏的文字中便說民國十五年八月：

這次孟真從柏林趕來巴黎和我同住了許多天，那時候他已經撒下了許多種子。他說中國一切文學都是從民間來的，同時每一種文學都經過一種生老病死的狀態。<sup>50</sup>

此外，在哲學的觀點上，傅斯年似乎也曾對胡適有所影響。民國七年傅斯年發表一篇文章，主張哲學門不當隸屬於文科，此文是傅氏深得蔡元培欣賞的開始。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哲學問題的解決有待科學的發展：

凡自然科學作一大進步時，即哲學發一異彩之日。以歷史為哲學之根據，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學為哲學之根據，其用至溥。

又說：

以為哲學、文學聯絡最為密切，哲學、科學若少關係者，中國人之謬見然也。

在于西洋，凡欲研治哲學者，其算學知識，必須甚高，其自然科學知識，必具大概

48 《詞選》(臺北：商務，1975)，〈序〉，頁9-10。

49 《白話文學史》(臺北：信江，無出版時代)中寫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的〈序〉中要人們特別注意他方面的觀點(頁10)。在頁13中胡適說「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民間的小兒女、村夫農婦、癡男怨女、歌童舞妓、彈唱的、說書的，都是文學上的新形式風格的創造者，這是文學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這條通例。」

50 《胡適講演集》，頁342-343。

。今吾校之哲學門，乃輕其所重，絕不與理科諸門謀教授上之聯絡，竊所未喻也。<sup>51</sup>  
不過此時他只是說哲學與科學較文學、歷史為近，但在歐洲受實證主義的深刻薰陶之後，他對哲學的看法更為激進，進而主張取消哲學了。他陸續說：

哲學是大假定。<sup>52</sup>

哲學一定要合經驗。哲學與科學用一樣方法。<sup>53</sup>

哲學不能出於人性。<sup>54</sup>

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麼一個健康的習慣。<sup>55</sup>

而且當他初抵國門不久，辦理中山大學文學院時，他決不諱言他的目標是：

絕國故，廢哲學，放文人，及存野化。<sup>56</sup>

而最終目標是「必使斯文掃地而後已」。這是傅斯年受當時歐洲實證主義影響的結果。而這些論點曾在巴黎見面時給予胡適相當深刻的影響。在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有一封信，也許是因為字跡太過潦草不易辨認，故並未收於《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在這封信中，傅斯年主張中國只有「方術」，沒有「哲學」，而且認為這是中國極幸運的地方——「多謝上帝，使得我們天漢民族走這麼健康的一路。」<sup>57</sup>他說：

我當方到英國時，覺得我好像能讀哲學書，甚至德國哲學書，後來覺得不能懂德國哲學了。覺得德國哲學只是些德國語言的惡習慣。現在偶然想起一部Hume來，也不知所謂了。總而言之，我的腦筋對於一切哲學都成石頭了。我于這個成績，也很歡喜。<sup>58</sup>

傅斯年這時以哲學為語言的「壞習慣」，以不能讀哲學為「很歡喜」。從胡適八月廿四日的回信可以看出胡適對此大有共鳴。由於胡適的回函保留在《傅斯年檔案》中未發表，故詳細摘抄於此：

孟真：前天發一信，已接到否？我決計住到九月三號，甚盼你能早來。……你最得意的三件事，我卻也有點相像。一、近來每用龐居士臨死的遺訓勸人「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龐居士也許注重在上半句，我卻重在下半句。你的幾句中

51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頁196-196。原刊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出版《北京大學日刊》第222號。

52 《傅斯年全集》，頁1255。

53 同前引。

54 同前引。

55 同前書，頁1521。

56 同前書，頁2445。

57 傅斯年民國十五年致胡適信，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頁357。

58 同前書，頁359。

國書，還不曾忘得乾乾淨淨，但這不關緊要。只要把那些細死人的繩索掙斷幾條——越斷的多越好——就行了。二、細人最利害的是那些蜘蛛肚裡吐出來自己細自己的蛛絲網，這幾年我自己竭力學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學，不看西洋哲學書，把西洋人的蛛網掃去了不少，自己感覺痛快……這一層我很得意。因為我是名為哲學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吃飯傢伙丟了。三、我很佩服你的「野蠻主義」。我近來發表一文〈論西詳近代文明〉，你若見了此文，定有許多地方能表示同意，我在那文裡說：「西洋近代文明不從宗教出發，而結果成一新宗教，不管道德，而結果自成一新道德」。此言與你的「一學得野蠻，其文明自來」同一見解，但沒有你說得痛快。」<sup>59</sup>

胡適在留學時期的日記中一再談到他將以哲學為志業，他是哲學博士，哲學教授，又以中國哲學史享大名，但從此以後卻傾向廢哲學。他真正將廢哲學的想法付諸行動是民國廿年擔任北大文學院長時，「曾言其辦文學院其實則只是辦歷史系，因其時適之已主張哲學關門。」<sup>60</sup>這和民國十六年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學文學院時想「廢哲學」的主張何其相近。為何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畢業的胡適，竟主張關閉哲學系，甚至在日記中不時吐露反哲學言論，如十八年六月三日日記上記：

.....

(2)哲學的根本取消：

問題可解決的，都解決了。一時不能解決的，如將來有解決的可能，還得靠科學實驗的幫助與證實。科學不能解決的，哲學也休想解決；即使提出解決，也不過是一個待證的假設，不足以取信于現代的人。

故哲學自然消滅，變成普通思想的一部份……。<sup>61</sup>

這是胡適原來所不曾有的想法。或許是與傅斯年的共鳴，認為所有哲學皆該消滅，並認為中國沒有哲學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sup>62</sup>

59 《傅楷》，I 1678。

60 《師友雜憶》，頁147。

61 《胡適的日記》，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條。

62 此外，胡適在日本京都支那學會演講時，提出一個與傅斯年在史語所工作旨趣中相同的看法，即西洋漢學家在所謂「虜學」的範圍中，貢獻特別大。傅氏是這樣說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都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如此等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傅斯年全集》，頁1305-6。）

《傅楷》V：26是傅在德國時的一本書目筆記，其中便列有「虜史」一目，我推測這個觀念在民國十五年，胡、傅二人巴黎見面時，傅氏可能也對胡適說到過。民國十六年四月間，胡適在京都演講時，依吉川幸次郎的回憶，他在黑板上大書「虜學」二字，並發揮了類似的觀點。見《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第十六卷，頁432。

以上是將傅斯年與胡適之間的思想交涉痕跡作一勾勒，主要指出在古史觀、文學觀，及哲學觀這三方面，傅斯年對胡適的影響。在古史觀與哲學觀上的影響對當時中國整個學術界具有相當的意義。以胡適在當時全中國思想學術界的關軸地位，他的逐步由疑古轉為相信，由破壞而走向重建，自有漣漪效應，而他接受上古二元集團的史觀，也對史學界的上古史詮釋有所影響。他在哲學上逐步傾向「取消哲學」，也是使他從未想過發展任何哲學思維來對抗當時日漸壯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原因之一。



## **Fu Ssu-nien's Intellectual Influence on Hu Shih: Some Remarks**

**Fan-shen Wang (王汎森)**

### **ABSTRACT**

Hu Shih and Fu Ssu-nien are always seen as scholars belonging to the same group. As is widely known, Hu Shih ha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Fu Ssu-nien when Fu was a student at Peita. In this short essay I attempt to demonstrate how some of Fu Ssu-nien's work (his hypotheses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genet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influenced Hu Shih. These influences can be traced through Hu Shih's diary, the Fu Ssu-nien papers stored in the Academia Sinica'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their writings.